

连昌宫与五花寺

乔文博

古代的两京（长安—洛阳）官道进入陕州地界后，一分为二：北路走张茅、硤石沿山而东，经澠池、新安抵达洛阳；南路则从交口、雁翎关穿山而过，沿着洛宁北塬迤迳东南，经宜阳洛水北岸直抵洛阳。前者称北崤道，后者称南崤道，相对于崎岖难行的北道，南道不仅舒缓易行，而且有旖旎的山水景观，是达官显贵、文人雅士乐走之路。白居易的一首诗道说得明白：“从陕至东京，山路低渐平。风光四百里，车马十三程。花供垂鞭看，杯多并辔倾。笙歌与谈笑，随分自将行。”

白诗中所说的这条路，正是从陕州经宜阳直达洛阳的古官道，也称洛陕南道。所谓“车马十三程”，是说四百里路中有十三个驿站。其中，三乡驿的位置非同一般，是战略要冲，也是交通枢纽，更兼所在地山川秀美、风光绝佳，从汉唐时期始，已是人文荟萃的繁华之地。三乡驿背依汉山，毗邻连昌宫。汉山之巔，有东汉永平初年修建的光武庙，地势高旷，视野开阔。站在山门口遥望，洛河对岸的女几山（花果山）群峰插天、婀娜多姿；俯视，则洛水蜿蜒东去，平畴沃野百里；脚下，五花寺殿堂庄严，九级佛塔巍然屹立。

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：“河南郡宜阳县有福昌宫。”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寿安县（指治所在韩城之宜阳）西二十九里有连昌宫，显庆三年置。”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又谓：“武德二年，更宜阳曰福昌，因隋宫为名。”宋《南部新书》称：“福昌宫，隋置，开元末重修。”明《一统志》称：“福昌宫在河南府宜阳县西坊郭保，隋炀帝建。”把上述五则史料综合考虑，似可得出如下结论：连昌宫即隋炀帝所建造的福昌宫（约610年前后），唐高宗显庆三年（658年）复置，唐玄宗开元末年（约740年）重修，改称连昌宫。

但还有一些别的说法，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是：福昌宫即兰昌宫，兰昌宫又名玉阳宫，其地在上庄保。这种说法主要的依据是《新唐书》：“河南府福昌西十七里有兰昌宫。”加上元代李镰《河南通志》中“兰昌宫一名玉阳宫”以及清代顾祖禹《方輿记要》中福昌宫改为兰昌宫的说法，于是就形成了“福昌宫——兰昌宫——玉阳宫”三宫实是一宫的说法，甚至于“连昌宫”也和上述三宫搅和在了一起，清《宜阳县志》在旁征博引之后对此也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。一方面说“兰昌宫一名玉阳宫，亦曰连昌宫，皆当时名称之异其词耳”，一方面又说：“若旧志所列叙，谓是一宫而两地并建，谓是两地而一时并起，当日情事应不若此，姑为之说以备考。”《县志》给出的一宫三名甚至一宫四名说，既然是“姑为之说以备考”，那就不能作为结论，仍有进一步探讨

的必要。

首先我认为，一宫四名说不靠谱，应为两地两宫。唐连昌宫系在隋福昌宫基础上重修复置，元玉阳宫则在唐兰昌宫基础上重修更名，前者为帝王行宫，后者为道家宫观。上引诸多史料中，《唐书》中“县西二十九里有连昌宫”和《新唐书》中“福昌西十七里有兰昌宫”的说法是同时并存的，是两宫而非一宫。所有史书中均找不到“连昌宫”即“兰昌宫”的直接证据，至于唐诗中“兰昌宫古殿旁”演绎出的“人鬼情”故事，则属荒诞的传奇，不足为凭。

说到“连昌”非“兰昌”，我还要特别提到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先生，即三乡当地的文化学者冯振伟先生。先生生前曾送我一本手稿——《唐诗人李贺故里探源》，全文约2万2千余字。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重在说明一个问题：李贺故里不在西柏坡，更不在大涧沟，而在上庄村。尽管我不能认可冯先生的这一观点，但先生翻阅史料的宏富、实地调研的认真，却令我感佩不已。他搜集的一些古碑文和坊间逸闻，为我们研究三乡乃至宜阳人文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文中先生整体引用了元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）的《玉阳宫铭并序》碑和明嘉靖二十一年（1524）的《重修玉阳宫记》碑，明确给出了两点结论：其一，玉阳宫西邻成汤庙，在“李马故宅”的基础上“拓地者四十余亩”建成，其中的“李宅”当为李贺家宅，具体地址应在上庄附近；其二，《重修玉阳宫记》碑1994年发现于三乡东柏坡，碑文中有“……境内，力士传宣念奴歌舞可徵矣。天宝之末，禄山乱而斯宫遂湮……其后不知何许，因遗址建之以宫，更名玉阳。”冯先生认为“作者以为玉阳宫即连昌宫遗址，实则误矣。连昌宫在洛水与昌涧水会合处，这个会合处在下庄。”

笔者亦仔细研读了两篇碑文（虽然有好多字漫漶不清），前者为“玄门掌教大宗师、洞明真人祁志诚撰”，后者为“儒学生员何继麟撰”，前者写于公元1285年，后者写于公元1524年，相去239年。洞明真人是道教大师，撰文中已详细交代了玉阳建宫由来及经过，写明系由观改宫，先有披云真人宋天师题额，后由撰文者祁志诚“改观之额而为宫焉”。这篇19000余字的长文，涉及人事甚多，但关于此宫的前身，仅提到成汤庙和李马故宅，通篇未提及连昌宫或帝王后妃一字。为名胜添光彩，为碑主唱赞歌，概为古今碑文撰写者一条不成文的“潜规则”，如玉阳宫果有作为隋唐帝王行宫的辉煌，碑文中必钩沉往事，歌之颂之引以为荣，何以只字未提？看来并非作者忽略，实则“玉阳”非“连昌”，撰文者不想张冠李戴、惹人诟病。然儒学生员何继麟所撰之重修碑，以“连昌”相标榜，并且置200多年前真人祁志诚的相关记述于不顾，竟然说“不知何许，因遗址建之以宫，更名玉阳。”何氏碑文之谬误，显而易见。

冯先生不因循旧说，敢纠古人之谬，指出连昌宫并非玉阳宫，功莫大焉。但先生关于连昌宫所在的推断，笔者却不敢苟同。冯先生依据邵雍诗中“洛水来西南，昌水来西北。二水合流处，宫墙有遗壁”的说法，便认定连昌宫在“合流处”的下庄村，也未免极端了些。试想，唐代的昌水尚且大到可以行船（见李贺昌谷诸诗），洛水之大更可想而知，下庄处于二水汇流形成的夹角最前端，雨季到来之际，必有水患之虞。隋唐之际，此处很可能还是一片水乡泽国，以当时的人口状况（笔者曾在《李贺故居究何在》一文中谈及唐代人口，认为当时的三乡及附近的人口不过数

百口)，地近昌水入洛处的下庄一带不会有村落，更不会有帝王行宫。

那么，连昌宫会在哪里？笔者注意到清《宜阳县志》中“五花寺”条目下的注释：“（在）三乡镇北，寺后有塔，相传为唐连昌宫故址。”这里，北据汉山，面迎洛水，五花寺建在汉山伸向昌、洛三角洲的台地北端，地势高燥，场面开阔，连昌宫建于此，“汉刹云山”和“唐宫烟水”上下呼应，既有帝王气象，也有烟水胜景，应属最佳选择。不要小看“相传”二字的史料价值，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“口述史”，应比千余年后人们出于各种动机的无端推测要准确得多。

根据有关史料记载：五花寺塔为隋文帝杨坚所建（见《从十善寺到五花寺》），连昌宫为隋炀帝杨广所建（见前文所引《一统志》）。在同一地点，为何改寺为宫？笔者认为当与主政者的个人好恶有关。文帝、炀帝父子俩是两个性格迥异的人。文帝宽仁，炀帝暴虐；文帝尚俭，炀帝喜奢；文帝远儒少文、崇信佛教，炀帝敏慧近儒以诗文自诩。炀帝对佛教的态度，虽不至于和其父南辕北辙，但起码热度大减。炀帝上台后，建东都，凿运河，大造离宫别苑，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华之需。即位之初的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就在宜阳的皂涧（今里沟河）出口处营造显仁宫和周围200余里的西苑，对隋炀帝这样一个好大喜功、荒淫无度的皇帝来说，在十善寺的基础上增其规模，再造一座行宫，不过是小菜一碟。

至于连昌宫和五花寺是否为宫寺一体、是否合乎礼制的问题，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些疑问，对此，笔者给出如下说明。首先，佛教自传入中国后，从南北朝一直到整个隋唐，是一个大发展时期。期间，虽经“三武（后魏太武帝、周武帝、唐武宗）灭佛”的局部挫折，但从整体上看，由于当政者的提倡，佛教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。北魏孝文帝、南朝梁武帝、女皇武则天和唐宪宗等都是崇佛的代表人物，有唐一代，从太宗到宪宗，许多帝王都有“迎佛骨”（佛舍利）到宫内供奉的举动。女皇武则天都洛期间，曾三次从法门寺“迎佛骨”到洛阳，甚至还把佛骨放置于禁苑内的明堂之上，供朝臣膜拜。所以，在宫内辟佛殿或者在皇宫近处建佛寺，以供帝王和后妃们礼佛，应该属寻常之事。这种遗风一直到明清时期，还可见踪迹。明故宫内有太善殿，清故宫内有万善殿，都是皇宫内的礼佛场所。清代顺治皇帝甚至把法师请至宫内讲经，对佛的尊崇达到走火入魔的境地，以致留下“顺治出家”的千古之谜。

天下名山僧占多。大凡佛寺所在，多为名胜之地，帝王行宫的选址亦然。就宜阳的几处行宫来看，五花寺伴着连昌宫，显仁宫毗连胜因寺，合璧宫原名八关宫，而八关宫本来就是由八关寺扩建而来。不过，由于改朝换代的影响，大多帝王行宫都只能风光一时，而佛寺却会长久传承。合璧宫所在的邵窑村，人们只知有八关寺，没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一座武则天垂青的合璧宫。五花寺塔至今仍然屹立，使人时时记起五花寺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里也曾是繁华一时的连昌宫。

“古塔笼烟水，山势寂寞雄。人说光武庙，昔日连昌宫。”作家李准当年访三乡时留下了这首诗，诗写得很好，可惜结句错了。应该是：人说五花寺，昔日连昌宫。